

吴越史事编年

诸葛计 编著
银玉珍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前 言

本书虽然是我们合作编写的《十国史事编年》中的第二本（第一本是《闽国史事编年》），但其主要工作都是由诸葛计先生完成的，我只不过是他的助手而已，前言理应由他来写。现在由于诸葛先生身患重病，不得不由我来完成这最后的工序。

编写《十国史事编年》的想法萌发得比较早，那是一九八〇年左右，在诸葛先生的思想上，或许还要更早一些。当时，我们刚完成了关于唐末五代的两部著作——《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》和《南唐先主李昇年谱》。在那两部著作的撰写当中，我们深感五代、尤其是十国史料的零散残缺。专记当时史事的两《五代史》及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的著作者们，由于为封建正统观念所囿，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原五个小王朝的更替，而将十国视为偏隅霸国，于其事往往疏略放失。有关私家著述虽代不乏有，但或因年代久远，佚而不存；或因作者的局限而仅记一国一地之事，令人难窥十国之全貌。清儒吴任臣博采诸史，铸成《十国春秋》一书，用力至勤，其功甚伟，人所公认。然限于其书之纪传体例，又以七八百年之后人而补撰先世之史，终难经纬兼顾，难免收桑

而失东。我们在日常翻检现存的类书、野史、笔记、文集、地志、金石文之中，往往时有所得，觉得有可补十国史之缺者，于是便产生了将这些零散的材料集辑起来，为史界提供一些较为方便使用的资料的强烈愿望。

这种愿望变成计划并付诸实施，得到了河北大学漆侠教授等一些史学前辈的帮助与鼓励。在十国之中，其所以选择《闽国史事编年》作为第一部，则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李瑞良和祝闽影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。当时，他们不但对我们编写《十国史事编年》的计划给予了热情的赞同，并在书的体例和具体写法上都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。

在此我要顺便说一下诸葛先生为撰写本稿所作的努力。诸葛先生在这部稿子上所付出的艰辛只有我最清楚。他是历史研究杂志社的编辑，主要任务是编杂志，搞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，故而他常对自己只是个“业余的史学研究者”。查阅大量的史籍和抄录大量的卡片，他主要是靠晚上和节假日。多少年来，他几乎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觉，搞通宵的事也时或有之。我主观上虽想多替他承担一些工作，但一则我是学中文的，于历史毕竟隔膜；再则是我在中学教书，还要担任班主任的工作，能挤出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，所以只能承担一些事务性的辅助工作。由于繁重的工作负担和长期的劳累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。在本书初稿将要告竣的时候，医院终于通知了他要住院做癌的切除手术。他曾想拖延若干时日，待稿子修改完后再住院，但医生不同

意。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，他只好带着剪刀、浆糊、多色笔，提着一大袋稿子住进了积水潭医院。在医院的二十一天中，只有手术的当天和第二天例外，其他的十九天他都在病床上修改自己的稿子（因为八个人一个病房，没有桌子，只能以床为案）。接着进行的放射治疗，反应很厉害，常常呕吐不止，他只好把一个脸盆放在脚边坚持修改。凡来看望他的人无不劝他注意保养、休息，而他总是说，癌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的精神先垮了。我手头有工作做，有个奋斗目标，精神就散不了，垮不了。待稿子完成送去出版社，我又有了希望和期待，将会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，精神就更不会垮了。就这样，他终于坚持完成了对初稿的修改。

编写《十国史事编年》的计划才刚开始，诸葛先生就得了这种病是很不幸的，不过他没被病魔吓倒，精神仍很乐观。记得前年冬住在医院，手术切片检查已肯定他患的是癌症之后，有位朋友去看他，对他开玩笑说：

“这下您真的成了半个司马迁了（将他做切除手术比作司马迁之受刑）。不要紧，我来给您写墓志铭。”他也笑着对这位朋友说：“我这么平庸的一生，谁给我写墓志铭是要犯难吃苦的。”后来他便写了一首《丙寅春病中呈某同志》的诗云：

高谊金诺作墓铭，愧将行状献人前。

仕未入品甘作吏，学匪职称算啥名？！

半个马迁纯谰语，一生潦倒是真情。

鬼门忽念君作苦，更回阳世四十年。

于此可见他的精神状态了。直到最近，他还考虑《吴·南唐史事编年》的编写问题。就在收到浙江古籍出版社对本稿的录用通知的当晚，他端端正正地书写了“十国编年，仅得其二，天假我年，更续其八”十六个字放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。我衷心地祝愿他早日康复，再将我们的合作计划进行下去。

本书虽然就要付排了，但我们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搞地方史不到实地去进行考察是危险的。《闽国史事编年》的初稿完成后，诸葛先生曾带着它两度到福建进行实地考察、访古，不仅补充了许多可贵的其他地方无法见到的材料，而且还纠正了不少原来史书记载上的错舛。他本来打算《吴越史事编年》完成初稿后，同样带着稿子到浙江各地进行一番考察核校工作，但病魔使他不能如愿成行。因此，本书在这方面的缺陷是显然的。在其他方面也肯定存在不少的缺点、错误。我们由衷地期待读者、尤其是浙江读者们的批评指正。

银玉珍

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

目 录

卷一

钱 璆篇（公元873—932年）（ 1 ）

卷二

钱元瓘篇（公元932—942年）（ 223 ）

卷三

钱弘佐篇（公元942—947年）（ 260 ）

卷四

钱弘倬篇（公元947—947年）（ 283 ）

卷五

钱弘俶篇（公元947—988年）（ 290 ）

吴越史事编年卷一

钱 鏐篇

钱鏐，字具美，杭州临安人。唐宣宗咸通十三年（公元八七二年）始从军。唐懿宗乾符二年（八七五年）隶石镜镇土团首领董昌麾下。累历石镜镇都知兵马使、杭州八都指挥使、两浙节度使、天下兵马元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父、尚书令、兼中书令、上柱国、吴越国王。后梁开平二年（九〇八年），正式建国，改元天宝，遂开五代吴越割据政权之基。后唐长兴三年（九三一年）三月卒，谥武肃。

唐懿宗咸通十三年（壬辰，八七二年）

是岁，钱鏐始从军。

钱鏐，字具美，路振《九国志》作巨美，诸书皆作具美。

杭州临安县（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县）人。唐宣宗大中六年（八五二年）二月十六日，生于石镜乡临水里。

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四，载吴越宝正三年戊子钱鏐《投告太湖龙简文》谓：“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、尚父、尚书令、吴越国王钱鏐，年七十七，二月十六日生。”宝正三年戊子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（九二八年）也。以是上溯七十七年，正值唐宣宗大中六年，谓鏐

生于大中六年，是，生日亦符。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及钱文选《武肃王年表》亦作二月十六日。四部丛刊本范垫、林禹《吴越备史》及《钱氏家乘·吴越庆系谱·世系》作二月二十六日，误。其邑里，《备史》作安国县衣锦乡勋贵里，盖以缪贵后更名耳。缪始生时，当以唐时旧称为是。父讳宽，《家乘·世系》谓：“宽，字洪道，……居镜山之下、官山之间。”素贫贱，以田渔为事。薛居正等《旧五代史》一三三，《世袭列传·钱缪传》谓：缪贵后，“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，穷极壮丽，岁时游于里中，车徒雄盛，万夫罗列。其父宽，每闻缪至，走窜避之。缪即徒步访宽，请言其故。宽曰：‘吾家世田渔为事，未尝有贵达如此。尔今为十三州主，三面受敌，与人争利，恐祸及吾家，所以不忍见汝。’缪泣谢之。”其先世已难考详。《吴越备史》以缪为唐武德中陪葬功臣、潭州大都督、曹国公九陇之八代孙，又谓其祖为唐宣州旌德县令。《备史》乃缪孙弘信托名之作，于其先辈多溢美回护之词，其说恐未足全据。《家乘》辑《武肃王八训》云：“吾祖自晋过江，已经二十七代。”又缪自制《钱氏大宗谱序》，更谓钱氏祖自少典，尤属难稽，宜诸书之不取也。

缪，小字婆留，《备史》谓其始生之夕，红光满室，父宽惊怪，欲弃诸井，其祖母水丘氏固留之，因小字婆留。宋袁夙名《枫窗小牍》谓：“予家后园圃有一大井，是武肃王外祖家旧物。井上有文曰：‘于维此井，淳育坎灵。有莘有邨，实此储英。时有长虹，上贯青冥。是唯王气，宅相先徵。爰起霸王，莫绥苍氓。沛膏渐泽，配德东溟。臣罗隐谨颂。’”今《罗隐集》中亦存此旧井铭文。盖缪贵后，隐为之铭也。《备史》又谓：缪“纯孝之道，禀于天性。每春秋荐享，必呜咽流涕，尝曰：‘今日贵盛，皆由积善所致，但恨祖母不能见耳。’”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亦载：缪省莖莖，有邻媪携浆黍迎于道，抚缪背，犹以小字呼之曰：“钱婆留，喜汝长成！”《家乘》谓：浙江临安县南二里许有塔山，“塔山上有功臣塔，下有婆留井。”凡是观之，宽欲弃缪于井及其祖母固留之事，

或非虚构，其小字婆留亦当可信。少时尝事骑牛操挺伐薪诸事。稍长，好拳勇，喜任侠，以解仇报怨为事。及壮，无赖，不喜生业，以贩盐为盗。善射与槊，稍通图纬诸书。王钦若等《册府元龟》四三一，《将帅·器度》门谓：“宾佐罗隐好讥讽，尝为诗言缪微时骑牛操挺之事，缪亦怡然不怒，其通恕如此。”《备史》一谓：“王自幼尝与群儿聚戏于树阴石上。或伐薪，必使群聚以供己，随多少而赏罚焉。”《家乘·武肃王年表》历数缪七岁始从师就学，九岁语人曰：“吾喜武而厌文。”十二岁受径山书院道人洪湮之劝而潜心攻书，喜读《春秋》。十五岁以家益窘遂废读，然犹温故，兼治《武经》诸书。十六岁贫甚，无以奉高堂，乃贩盐谋生。每担盐斤二百余，行走甚捷。十七岁习武，二十岁习弩，二十一岁好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兼温《春秋》。姚鸣鸾《（成化）淳安县志》二，《山镇·担盐山》条云：“担盐山，在县西一百一十里，相传钱缪微时尝贩盐经此。苦渴，以柱触岩，泉忽涌出，后人因名其山担盐山，泉曰柱杖泉。”《家乘》辑《武肃王八训》谓：“吾七岁修文，十七习武。”《宣和书谱》谓：“缪喜作正书，好吟咏，通图纬学，所书刚劲结密。今御府所藏正书一页枣贴。”皆谓缪初通文墨。然清人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则云：“钱武肃王目不识书。”今从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。时，临安县录事钟起者，有子数人。缪尝与之饮博，起每禁之，不止。后有术者言缪骨相非凡，当大贵。起乃纵诸子与之游，且时时贷其穷乏。《新五代史·吴越世家》云：“县录事钟起有子数人，与缪饮博。起尝禁其诸子，诸子多窃从之游。豫章人有善术者，望牛斗间有王气。牛斗，钱塘分也，因游钱塘。占之在临安，乃之临安。以相法隐市中，阴求其人。起与术者善，术者私谓起曰：‘占君县有贵人，求之市中不可得。视君之相贵矣，然不足当之。’起乃为置酒，悉召贤豪为会，阴令术者徧视之，皆不足当。术者过起家，缪适从外来，见起反走。术者望见之，大惊曰：‘此真贵人也。’起笑曰：‘此吾傍舍钱生耳。’术者召缪至，熟

视之，顾起曰：‘君之贵者，因此人也。’乃慰繆曰：‘子骨法非常，愿自爱。’因与起诀曰：‘吾求其人者，非有所欲也，直欲质吾尔。’明日乃去。起始纵其子与繆游，时时贷其穷乏。”清·陈兆元《东天目山昭明禅寺志·高贤》谓：钱繆应募从军，“天目法济禅师见之，执其手屏左右谓曰：‘好自爱，他日贵极，当以佛法为主。’故繆贵之后，遂大创佛寺，盖不忘禅师之悬记云。”

唐自宣、懿以来，已入末季，政乱赋繁，人不聊生，民变兵哗，时有发生。裘甫、亦作仇甫。字垂之，浙东人，少事农亩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（八五九年），率百人起义于浙东，攻下象山、剡县，众至三万。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，改元罗平，铸印天平。又连克唐兴、上虞、余姚、慈溪、奉化、宁海诸县，败浙西（治润州，即今江苏省镇江市）、宣歙（治宣州，今安徽省宣城县）进剿之师。咸通元年（八六〇年）六月，唐廷以前安南经略使王式，发忠武（治许州，今河南省许昌市）、义成（治滑州，今河南省滑县）、淮南（治扬州，今江苏省扬州市）三道兵讨之。后，甫以战略错误遂以兵败牺牲，起义失败。庞勋，徐州健卒也。派成桂州（今广西桂林市）为粮料判官。咸通九年（八六八年）七月，以瓜代失期，因众怒，遂群起劫库兵而北归。历湖湘，沿江东下，经浙西入淮南而达淮北。克宿州（今安徽宿县），悉以城中财货令民自取。四远云集，不旬日而众至五万。又北克徐州，远近震动。附近十余县亦尽入掌握中。唐以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，发诸道兵二十万围剿。至咸通十年九月，庞勋亦以战略之误而失败。起义，即其规模之大者也。诸色乡兵土团亦所在皆起。至是，钱繆年已二十有一矣，以生计所迫，始入投乡兵。按：繆始从军之岁，诸书皆未明载，唯《家乘》所辑之《遗训》谓：“十七习武，二十一上入军。江南多事，溪洞猖獗。训练义师，助州县平溪洞。”其《年表》亦云：咸通十三年壬辰，王二十一岁，始从军。”今姑采是说。

【本年时事附录】①

十二月，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恣横专杀，唐廷徙之为大同防御使，国昌拒不受命。是时，诸藩镇辄以力自雄，唐廷皆莫可如何。国昌之拒命，止其一例耳。

唐僖宗乾符二年（乙未，八七五年）

是岁，钱鏐隶董昌麾下，为石镜土团偏将。

是年四月，浙西狼山在今江苏省南通市南，雄峙大江北岸，与常熟之福山相对，为江海锁钥。唐时设镇遏使驻于是。镇遏使王郢等反。先是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，节度使赵隐，字大隐，京兆奉天人。会昌中擢进士第，历州刺史、河南尹，咸通末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。僖宗初，罢为镇海军节度使（即浙西节度使）。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。郢等论诉不获，遂劫库兵而反，行收党众近万，攻陷苏、常等地，掠及两浙及福建州县。唐廷亟敕本道征兵讨之。唐僖宗《讨王郢诏》云：“王郢，江乡贱卒，营伍微材，忽抚御之小乖，敢凭陵而构乱。迫胁将相，恣窃干戈，劫资财于建邺之城，聚徒党于狼山之戍。寻则浮江泛海，掠镇攻城，擄掠三州，伤残万户。又于福建管内，毒害生灵，凌犯纪纲，悖违天地。朕为人屈法，恶杀好生，累降敕书，曲存招谕。王郢包藏奸慝，诬惑军师，诈示归降，密为抗拒。昨者拘留鲁实，已验凶狂；今闻再犯温州，显与官军抵敌。鲁实陷在舟楫，王师败于锋镝，两浙震惊，百姓忧扰，滔天之罪，擢发难书。然以分野兴灾，虽关定数，神祇助顺，必剪群凶。既违雨露之恩，宁道雷霆之殛，是以别铨名将，更益雄师，兼福建之精兵，杂番禺之战士。水陆俱发，腹背齐攻，须克旬时，必破妖孽。除先征诸

①本书中凡吴越以外之大事，均摘要叙录，以便概见是时全国之形势，附于各岁之末，以为该年时事附录。有大事则书，无之则免。

道五千一百人及福建、南海，并虔、吉、衡、婺等州兵士外，今更抽忠武军一千五百人、感化军五百人、泗州五百人、宣州五百人，都计一万五千以上。前左武军大将军宋皓，负关、张勇志，有韩、白英雄，累著成功，再居环卫，思豺狼之未灭，耻荆棘之犹存，誓愿长驱，速清群丑。今除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守龙武大将军、兼御史大夫、充江南诸道招讨使。应新旧行营兵士，悉取指挥。各宜愤激忠诚，淬厉戈戟，识机剪扑，取势芟夷，速立殊勋，迎俟超奖。其王郢部下徒党等，或本同谋议，或偶被胁从，或因穷饿依投，或遭俘缚指使，所宜舍逆取顺，去暗趋明，勉图富贵荣华，勿受驱除剪戮。如生擒及斫得王郢头归顺者，当授四品正员官，并赏钱一万贯，赐庄宅一区。如能率众于所在解甲归顺者，亦当厚与爵赏。明垂信誓，必不欺渝。凡在忠烈之徒，皆宜贾勇增气。”临安石镜镇人董昌，以捍卫乡里为名，募集土团军。镠应募为偏将。《备史》谓：

“乾符二年夏四月，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，敕本道征兵讨之。时董昌戍石镜镇，亦募乡里之众，以副召王，王遂委质于董氏，始为偏将。王入军中，骁勇绝伦，为董氏所重。”《新五代史》谓：“唐乾符二年，浙西裨将王郢作乱，石镜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，表镠偏将，击郢破之。”《宣和书画谱》谓：钱镠“倜傥有大度，意气雄杰。唐末乱离，依里同董昌，啸聚乌合之众，名为御冠，而实自陷之。”

【本年时事附录】

正月，濮州人王仙芝聚众起义于长垣，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，传檄诸道，指斥唐廷官吏贪沓、赋重，赏罚不平。王仙芝初起之时，凡有二说，一谓乾符元年，一谓二年初。余赞活说，详参拙文《对黄巢起义记事墨迹内容的质疑》，载中华书局《文史》一九八一年第十二辑。

六月，王仙芝克曹、濮二州。曹州冤句人黄巢聚众响应，联军攻掠诸州县。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至岁末，响应者遍及十馀州，至于淮南，多者千余人，少者亦数百人。唐廷命淮南、忠武、宣武、义成、天平五节度使、监军，亟加讨捕及招怀。

十二月，王、黄义军围沂州，唐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，率诸道兵进攻。

唐僖宗乾符五年（戊戌，八七八年）

九月，钱镠随董昌率兵抗击起义军，升石镜镇都知兵马使，迁镇海军职。

先是乾符四年冬，王仙芝部义军于蕲、黄分兵。有曹师雄者率部入江南，往来于两浙。师雄，邑里未详。乾符二年初，随王仙芝首义于长垣，为票帅。后随仙芝转战蕲、黄，分兵入江南。乾符五年二月掠宣、润，四月攻湖州，后事未详。复有朱直，邑里无考。《十国春秋》作朱直管。《备史》谓“杭州山贼朱直为乱。”后梁翰林学士李琪《钱镠生祠碑铭》作朱实。今从《备史》及皮光业《武肃王庙碑铭》。王知新、《生祠碑铭》作倪知新。孙端者各聚党数千人响应，活跃于宣（州，治今安徽省宣城县）、歙（州，治今安徽省歙县）间。皮光业《武肃王庙碑铭》云：“王仙芝结衅中土，首构祸阶。虽已诛夷，犹残枝党。……江南则朱直叛乱于唐山，孙端寇孽于安吉。西侵宛水，东犯茗溪。郡县则终日登陴，生民则长时伏莽。”其他未知名姓之小股起义，又不知凡几。镠率石镜镇兵往来抗击义军于本境。以“功”闻，《武肃王庙碑铭》云：镠“手杖义旗，身当勍敌，一月之内，二寇殄平。静千里之山川，救两郡之涂炭，是王之初功也。”唐授以石镜镇都知兵马使，迁镇海军职。诸书皆谓迁镇海军右职，《武肃王年表》作迁镇海军右副使。

【本年时事附录】

二月，王仙芝部义军败于黄梅，仙芝牺牲。尚让帅馀部归黄巢于亳。巢号冲天大将军，建元王霸。

三月，黄巢率军经汴、宋而南，由和州渡江。自夏至秋，活动于两浙。

十二月，巢军入闽，克福州。

沙陀族人李克用叛唐于云州，唐发河东、昭义等道兵讨之，为其所败。

唐僖宗广明元年（庚子，八八〇年）

七月，钱镠率兵袭黄巢义军于临安境。

先是去年十月，黄巢率军自岭南北上，连下潭州（治今湖南长沙市）、江陵，受阻于荆门。十一月折而沿江东下，攻鄂州（治今湖北省武汉市）外廓，转掠饶（州，治今江西省波阳县）、信（州，治今江西省上饶市）、池（州，治今安徽省贵池县）、宣、歙、杭等州，众至二十万。至是，巢军一枝二千人入于临安境，钱镠率兵阻袭。义军意在渡江西进，无意与之周旋，遂退去。《备史》于是事大为张扬，谓：“（乾符）六年秋七月，黄巢拥众二十万人大掠州县。淮南节度使高骈羽檄征兵讨之。时巢三百余众将及石镜镇，王谓董氏曰：‘黄巢以数万之众，逾越山谷，旗鼓相远，首尾不应，宜以伏兵袭之，贼或少却，则可逐矣。’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。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。巢小将单骑先进，王亲注弩射之，应弦而毙，伏兵遂起，巢兵大溃。王谓众曰：‘此术止可一举耳，大军必至，则众寡莫敌矣，宜乘胜张虚声以慑之。’乃进屯八百里。途次逆旅，遇一老嫗而诫之曰：‘后有兵至，当言临安兵屯八百里。’未几，巢兵果至，具如所对。贼众相顾曰：‘向止数骑，尚不可当，况八百里乎！’遂不犯境。王又伺其后军，杀获人马而还，归功董氏。淮南高骈闻而伟之。”《家乘·武肃王八训》更谓：“又值黄寇奔冲，日夜领兵七十来战，固守安国、余杭、於潜等县免被焚烧。”皆有夸大之词，未足全信也。八百里，地名也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谓：“八百山，在县东北

十里。有三峰甚高，中峰大将山，西峰紫藤山，东峰八百山，共周九里。”八百里或即在八百山下也。

按：诸书所记此事，大体同于《备史》，而系年则大相径庭。《新五代史》系其事于乾符二年，谓：“是时黄巢众已数千，攻掠浙东，至临安。繆曰：‘今镇兵少而贼兵多，难以力御，宜出奇兵邀之。’乃与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。巢先锋度险皆单骑，繆伏弩射杀其将。巢兵乱，繆引劲卒蹂之，斩首数百级。繆曰：‘此可一用尔，大众至，何可敌耶！’乃引兵趋八百里。八百里，地名也。告道傍媼曰：‘后有问者，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。’巢众至，问媼语，不知其地名，曰：‘向十余卒不可敌，况八百里乎！’遂急引兵过。”是乃与繆初起事连书，未足为系年据。皮光业《武肃王庙碑铭》云：“黄巢来从五岭，直下三衢。”知非巢南下时事，而为自岭南北返时事也。《备史》暨《新唐书·黄巢传》系于乾符六年，《十国春秋·吴越世家》暨《钱氏家乘》因之，皆不当。巢军乾符六年十月始发于岭南，十一月尚在襄阳，广明元年三月方攻饶、信二州，安得有乾符六年而至临安之事？《备史》系年虽误然，作七月则近是。巢军以广明元年七月于采石渡江，渡江前途经临安，遭繆兵伏袭，小有损失，无暇与之计较，繆遂幸收其功耳。故今采七月之说。

是岁，钱繆与董昌应召赴广陵谒高骈，旋辞归本镇。

黄巢渡江北去后，唐诸道行营都统、淮南节度使高骈 骈，字千里，幽州人，元和初功臣、南平王崇文之孙也。家世禁卫。骈累历神策军都虞侯、秦州刺史、安南都护、静海军节度使、天平军节度使、成都府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、镇海军节度使。乾符六年十月改淮南节度使。广明元年三月升诸道行营都统。甫受任，遂传檄征天下兵，得土客兵七万众，妄图围歼黄巢义军于江南而不遂。

闻鏐与董昌尝阻袭义军，遂召赴广陵，欲以自随。

鏐劝昌辞归。《新五代史》谓：“都统高骈闻巢不敢犯临安，壮之，召董昌与鏐俱至广陵。久之，骈无讨贼意，昌等不见用，辞还。骈表昌杭州刺史。”《备史》云：“既而，高骈召董氏赴广陵，王亦从焉。时，骈熟视王，顾左右曰：‘此人他日爵禄必远过于我。’时骈将大举讨巢，命董氏从行。王谓董曰：‘窃见高公无讨贼之意，苟从其行，功效不立，是同坐罪，宜以捍卫乡里为辞。’董然之，告于骈，骈因以礼而归焉。”

杭州始建八都，以董昌为主，钱鏐为都指挥使。

是年九月，巢军渡淮西指，十一月克洛阳，十二月初五日克长安，唐僖宗仓惶出逃。时天下乱甚，拥兵自重者比比也。杭之诸县，先时已各有乡兵。至是团聚，县各千人，领以团首，曰都将。临安县为董昌，余杭县陈晟，《备史》谓：晟，余杭人也。

八都建，因称清平镇将。於潜县吴文举，盐官县徐及，《备史》谓，海盐都号海昌。新城县杜稜，稜，字腾云，新城人。

《九国志·杜建徽传》谓：“稜，广明中为镇海军节度副使，历常、润二州刺史、两浙行军司马。黄巢之乱，稜归乡党，保聚徒众，得千余人，号武安都。”《十国春秋》本传谓：“当唐乾符、广明间，盗贼充斥，寇掠两浙无虚日。杭州练诸县乡兵讨之，稜时为东安都将，更号武安营，与董昌、徐及、凌文举等称杭州八都，推昌为长，而以武肃王副之。”唐山县饶京，亦作饶景，青州淄水人。《十国春秋》

本传谓：“杭州建八都，景为唐山都将。”富春县文禹（一作闻人字），龙泉县凌文举，邑里俱失考。号曰杭州八都。罗隐

《吴公约神道碑》云：“黄巢之将叛也，天下骚动。杭之豪杰举挺以卫乡里者八人，故立八都之号。”八都都将，诸书所载略有异同。

《通鉴》谓：临安董昌，钱塘刘孟安、阮结，富阳闻人字，盐官徐

及，新城杜稜，余杭凌文举，临平曹信，各为之都将，号杭州八都。其后宇卒，钱塘人成及代之。《杭州府志·杜稜传》采是说，然其《周宝传》又采《备史》之说。今从《备史》。董昌总之，以缪为都指挥使。《新五代史·吴越世家》谓：“是时，天下已乱，昌乃团诸县兵为八都，以缪为都指挥使，成及为镇江都将。”按：八都之建，《通鉴》系于乾符五年，恐未确。其年六月，黄巢率义军攻掠宣、歙，八月攻杭州，九月克越州，其后方入闽。是年自夏及秋，义军正活动于两浙，其间未见八都兵与义军交战之举。至今年七月，钱缪截击义军时，缪语老嫗亦仅曰：“后有兵至，当言临安兵屯八百里。”而未曰八都兵屯八百里，足见是时尚无八都之称。八都之设当为今年冬后事。《新五代史》作董昌已为杭州刺史（广明二年）之后。今从《备史》。八都都将之人，诸书所载有异，或先后变易耳。

【本年时事附录】

三月，唐以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。骈乃传檄征天下兵，且广为召募，共得土客兵七万。

五月，巢军败高骈主力于信州，杀其大将张璘，唐之江防遂溃。

七月，巢军自采石渡江，围天长、六合，势甚盛。高骈怯，称风痹，不复出战。

是月，李克用败奔鞑靼。

九月，黄巢渡淮。

十一月，巢军克唐东都洛阳。

十二月，巢军入关，随克唐都长安，唐僖宗仓惶出逃；巢即帝位于长安，建国号大齐，改元金统。

是岁，寿州屠者王绪率众起义，据霍丘，自称镇使。旋逐刺史颜璋，遂有寿州。